

光荣与幸福：从军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经验证据

湛泳 李珊 胡艺怀 陈华帅*

【摘要】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论文利用Probit模型及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探究了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从军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且这种提升效应在划分地区子样本和保留男性样本的情况下依然存在。根据作用机制分析结果，从军经历及相应的保障政策对居民应聘国有单位和获取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等生活保障有积极影响。就职于国有单位、养老保险、自有住房、社会资本等因素能显著提高退役军人的生活评价。该结果表明，在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退役军人的就业动态，提高其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此外，有关部门还应持续优化住房保障、荣誉维护等方面的管理体系，以切实保障军人军属的转移性收入与荣誉。

【关键词】从军经历 生活满意度 身份福利效应 社会保障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23)04-0124-18

作为国家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的坚实护盾，中国军人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强调要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退役军人管理、抚恤和保障工作正式迈向新阶段。202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以下简称《退役军人保障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的法律条文，该法案从

* 湛泳，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李珊，湘潭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艺怀，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华帅，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本文曾在《公共行政评论》第六届青年学者论坛、第五届劳动经济学会年会、首届战略与防务经济学术年会上宣读。感谢与会专家学者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优化研究”（21AJY009），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新时代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9A481）。

名誉、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法治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领取国家定期抚恤金、定期生活补助金的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827 万人。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我国对退役军人生活水平与福利影响因素的评估需求相当迫切，以学术研究服务和支持相关工作成为改善退役军人生活条件的题中应有之意。

目前，我国学者已从福利制度设计（张伟东，2008）、管理机构运作（李玉倩、陈万明，2018）等宏观角度提出建议，但鲜有学者从微观视角分析退役军人生活福祉改善的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综合社会资本、保障政策等主客观因素，实证检验退役军人身份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原因有二：一方面，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综合判断，是个体衡量幸福感受的主要依据（Diener，2000）。另一方面，个体的民生福祉是否得到改善往往依赖于个体本人的主观判断，而通过自陈量表法得到的“生活满意度”指标已被学者们广泛接纳和使用，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已得到多次验证（Bertrand，2013；冯明、赵佳涵，2022）；围绕这一指标开展相关研究不仅能有效评估退役军人的生活感受，而且有助于精准识别提高军人生活水平的具体路径。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借助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就从军经历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以期对退役军人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化提供参考建议。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身份经济学与民生福祉的交叉研究。“民生三感”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主要标志，本文在充分考虑居民特征和政策规定的基础上，从微观个体出发，运用 CLDS2018 调查数据就从军经历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差异性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从军经历与民生福祉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拓展国内对退役军人保障问题的分析视野。与以往着眼于宏观政策分析和以经济效应为主的参军回报的研究不同，本文通过使用数理方法将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险等微观要素引入退役军人权益保障的相关分析，旨在拓展退役军人相关研究的切入视角。第三，揭示从军经历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基于不同个体在就业单位、住房条件、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识别了从军经历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传导路径，对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和加快实现“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 2035 年远景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

观认为,人们通过不断地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来获得幸福。20世纪70年代,幸福问题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经济学家 Easterlin (1974) 将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因素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国民平均幸福感并未随国家富裕、人民收入增加而提升。1978年,Tajfel (1978) 首次提出认同理论,并主张个体对加入能够提升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可的群体的意向更强烈。Hoelter (1983) 基于角色认同理论提出,个体对角色的认同感是参与角色行为的动力来源。Tajfel 和 Turner (1986) 在完善社会认同理论时发现,个体在与具备良好声誉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幸福感最强烈。随着 Akerlof 和 Kranton (2000) 首次将身份因素纳入新古典效用模型并提出“身份认同假说”,经济学在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领域的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宽。一方面,现有研究已然证实先赋身份,即个体与生俱来的身份,或因其成长而自动获得的外生身份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如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高而中年人较低,年龄的幸福效应曲线呈U形;女性的生活满意度相对男性更高 (Alesina et al., 2004)。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关注并探讨了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就业经历、住房情况等受个体自致身份影响的因素 (张翔等, 2015; 陆方文等, 2017; 聂伟, 2019) 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内在联系。

除此之外,学者们对于能帮助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影响个体行为选择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身份更为重视,“退役军人”身份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军人群体对国防安全具有特殊贡献,各国往往会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设立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退役军人的生活水平 (王沙骋等, 2020), 个体可凭借退役军人身份依法享受优待政策,以获取工作机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资源,实现生活质量在物质层面的改善。此外,在精神层面,退役军人会通过遵守军人特定的行为规范,在共同树立的社会形象中获得社会认同并进而拥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从军经历有利于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

从作用路径来看,就业、医疗、养老等条件是影响个体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首先,工作单位往往决定个体收入等物质福利水平。我国早期的退役军人就业安置以政府计划分配为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转为政府安排和自主就业相结合的安置模式 (刘纪达、王健, 2019), 但整体上仍保留了退役军人进入国有单位工作的优待政策。早期颁布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明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优先接收军队转业干部。随着有关制度的逐步完善,退役军人在报考国家公务员、应聘企事业单位时,在同等条件下可被优先录用。而入伍前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就职的退役军人,在退役后可依规定复工复职并享受不低于同等条件职工的各项待遇。可见,我国退役军人在党政机关等

国有单位招聘中具有优势。而研究发现，在党政机关等体制内单位工作的居民幸福感更高，因为体制内员工的社会地位和福利水平更高（吴愈晓等，2015）。同时，作为员工权益和福利的维护者，工会组织在国有单位的覆盖率更高，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张抗私、刘翠花，2018）。基于此，本文根据“个体第一份和最近一份工作是否就职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营企业等国有单位”设立中介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进入国有单位工作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其次，政府为某些身份群体制定的优待政策能提高个体参与社会保障的概率，进而影响其生活福利水平。例如，美国退役军人医疗保障政策有效提高了退役军人医疗保险覆盖率，截至2016年，仅3.7%的退役军人尚未参保（Zelaya & Nugent, 2018），且医疗养老体系已为数百万名伤残退役军人发放补偿救济以缓解其财务压力（Coile et al., 2015）。同时，既有研究还证实退役军人养老保险金的发放能改善受益人生活质量，延长其寿命（Salm, 2011）。目前，我国军人保险涵盖伤亡、退役医疗和养老保险等项目，参保费用部分由国家补贴，由军队部门收取保费并负责管理和赔付，军人退役后保险关系转接到安置地部门。此外，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可将军龄视为参保年限，并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总体而言，退役军人更容易参与医疗、养老保险项目，而社会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侯志阳，2018）。因此，本文根据“个体是否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构建养老保险中介变量，并以个体“是否参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构建医疗保险中介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更积极地参与养老保险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假设4：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更积极地参与医疗保险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再次，作为个体社会生活的必需品，住房是退役军人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住房安置也是退役军人福利保障的重要内容。2001年，《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已对退役军人住房补贴等内容做出规定，面向军人群体出售的军队经济适用房、统建房和依靠安置地接收单位分配住房的相关政策都旨在帮助退役军人获得稳定的自有住房。2020年，《退役军人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对退役军人合理居住权益和安置住房优待的保障，符合条件的军队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在军人退役后可依程序优惠申购军队经济适用房或统建房，住房产权归本人所有，并可申请住房和物业补贴。而根据我国城市总体社会调查的研究结论，拥有自有住房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

度和家庭幸福感（张翔等，2015）。基于此，本文构建自有住房产权的中介变量，当个体住房为完全自有或自己子女所有，记为1，否则为0，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获得更高的住房自有率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随着保障政策的逐步完善，军人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其贷款需求将低于非军人群体。基于住房安置和购房补贴上享有的优待条件，退役军人面临的债务负担会因家庭主要经济压力的缓解而降低，由此导致的生活福祉的损失也将变小。同时，退役军人在获取创业补助和融资支持方面也享受一定的优待，如财政贴息、贷款额度提升等。而包括住房负债、经营性负债和其他负债在内的家庭负债行为会对居民幸福感带来显著的负面作用（李江一等，2015）。一方面，为偿还家庭债务，居民需要被迫增加劳动供给，闲暇时间的减少会降低居民幸福感（何启志等，2022）；另一方面，长期债务压力会严重损害居民的身心健康，在被迫减少健康投入的同时增加心理焦虑，显著提高居民抑郁程度（Leung & Lau, 2017）。基于此，本文根据个体“是否有尚未结清的贷款”构建债务方面的中介变量，当个体存在尚未结清的贷款，记为1，否则为0，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减轻债务负担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最后，社会资本有助于退役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根据社会认同理论，拥有同一身份的群体成员共同承受社会舆论对该身份群体的褒扬或偏见，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评价（Tajfel, 1978）。“拥军优属”是我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军人在服役结束后往往仍会遵守与军人身份对应的行为规范，并从社会支持与身份认同中扩大人际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传递就业信息、提高工作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能个人提供情感沟通、归属感等精神支持（Leung et al., 2011），社会身份与社会资本的双向转化关系通过物质帮助、精神支持两方面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发挥积极作用。已有文献研究发现（如刘一伟、汪润泉，2017），家庭人情礼的开支往往用于维持家庭社会网络，礼金数目与礼金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重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与质量，并用于评估个体人际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真实状况。因此，本文选取家庭层面的“人情礼支出对数”与“人情礼支出占比”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积累社会资本并由此提高生活满意度。

诚然，学者们已然关注到了退役军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从社会保障、住房安置等角度开展了前期研究。但略显不足的是，能将就业、保险、住房等因素有机结合，并从社会保障角度探究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内在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将运用个体微观数据库对以上理论假设进行实

证检验，进一步拓展从军经历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8 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样本覆盖除我国港澳台、西藏、海南外的 29 个省市家庭，以轮换样本追踪方式调查家庭劳动力工作、健康、经济活动等众多社会内容的现状和变迁情况。2011 年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下简称《兵役法》）明确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可应征入伍，入伍后最低服役期限一般为两年。为保证服役经历的完整性，本文选取 18 周岁及以上的人群作为样本，并剔除了服役一年及以下和主要变量缺失值严重的样本数据。此外，本文将汇报“拒绝回答”“不适用”“不清楚”的样本值统一视作缺失值并予以剔除。经处理后，本文保留了 7557 个样本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被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根据 2018 年 CLDS 调查问卷，关于生活满意度的主观问题为：“总体来说，您对您的生活状况感到满意么？”被访者有“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5 种选项，对应的评分为 1—5，数值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参照 Bertrand（2013）、周烁等（2020）的研究方法，为尽可能缓解问卷调查中难以避免的“中心趋势偏差”问题，结合本文更关注被访者对生活状况“满意与否”的方向性维度的研究事实，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构造为一个二元变量，即当被访者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非常满意”时，被解释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为从军经历。根据被访者对“是否参加过军”的回答及其具体的服役年限，本文得以衡量被访者是否拥有较完整的从军经历（是 = 1，否 = 0）。退役军人样本为 216 个，约占总样本的 2.86%，符合实际情况。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对性别、出生时户籍性质、父亲职业等发生于个体从军选择前并可能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加以控制。

表 1 报告了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主要变量的样本量均为 7557 个，我国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值为 0.6738，全样本的男女比例接近 1:1，少数民族占比 8.85%，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基本符合我国社会人口特征；而参军个体以汉族男性居多，也与现实情况相符。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i>Satis_f</i>	满意 = 1; 不满意 = 0	0.6738	0.4688
从军经历	<i>veteran</i>	有从军经历的退役军人 = 1; 无从军经历 = 0	0.0286	0.1666
性别	<i>gender</i>	女性 = 1; 男性 = 0	0.5102	0.4951
户籍性质	<i>hukou</i>	出生时户籍为非农业户籍 = 1; 农业户籍 = 0	0.1347	0.3414
民族	<i>nation</i>	汉族 = 1; 少数民族 = 0	0.0885	0.2841
宗教信仰	<i>religion</i>	有宗教信仰 = 1; 无宗教信仰 = 0	0.0971	0.2962
父亲职业	<i>fa_job</i>	父亲职业为农林渔民/个体户 = 1; 其他 = 0	0.7215	0.4483
母亲受教育年限	<i>mo_edu</i>	研究生及以上 = 22、本科 = 16、专科 = 15、高中（含中专、技校）= 12、初中 = 9、小学 = 6、无受教育经历 = 0	2.6574	3.7694
兄弟姐妹数目	<i>sibling</i>	兄弟姐妹数目（位）	3.5136	2.0459
边境冲突时是否符合服役年龄	<i>d_age</i>	符合 18 - 22 岁的服役年龄 = 1; 不符合 = 0	0.1768	0.3815
恢复高考时是否成年	<i>age18</i>	1977 年恢复高考时年满 18 周岁 = 1; 未满 18 周岁 = 0	0.2910	0.4542
第一份工作就职于国有单位	<i>job_1</i>	第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 = 1; 其他 = 0	0.1482	0.3553
最近一份工作就职于国有单位	<i>job_2</i>	最近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 = 1; 其他 = 0	0.1303	0.3367
与从军有关的医疗保险	<i>ve_med</i>	有城镇职工或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任意一项 = 1; 没有 = 0	0.8973	0.3036
与从军有关的养老保险	<i>ve_end</i>	有机关事业单位、城镇职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任意一项 = 1; 没有 = 0	0.6357	0.4813
自有住房产权	<i>house</i>	当前住房产权自有、子女所有 = 1; 否 = 0	0.3889	0.4875
人情礼支出对数	<i>lrnq</i>	家庭礼品和礼金年总支出对数	0.2417	0.2780
人情礼支出占比	<i>renq_p</i>	礼品和礼金年总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	0.1036	0.298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的构建

由于难以观测到所有影响个体参军选择的因素，模型中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有偏。考虑到本文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均为虚拟变量，IV Probit 模型并不适用。为此，本文借鉴叶金珍和王勇（2019）的研究方法，采用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进行检验。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围绕个体出生年份及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年限构建工具变量是解决从军经历内生性问题的思路（Law & Mills, 2017；王元芳、徐业坤，2020）。因为出生年份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随机外生的，而重大历史事件又很可能改变当时适龄人群入伍的概率，如大规模战争和恢复高考，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性较强。因此，本文结合既有研究与我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构建“边境冲突时是否符合服役年龄”“恢复高考时是否成年”两个工具变量。一方面，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会提高数年内适龄群体的入伍概率。由于1955年颁布的《兵役法》未涉及具体的入伍年龄上限，本文参照1984年《兵役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个体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及后5年是否符合18—22岁的服役年龄来构建工具变量（ d_age ），为1969—1974年间18—22岁的个体赋值为1，否则为0。另一方面，1977年恢复高考增加了青少年未来的发展选择，但由于学习能力不足、家庭经济困难等客观因素普遍存在，应征入伍对当时的成年人仍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基于此，本文对1977年已年满18周岁的个体取值为1，否则为0，以此构建工具变量 $age18$ 。

（四）模型设定

结合变量特点和模型内生性的考虑，本文选用 Probit 模型和 CMP 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Satis_fi = \alpha_i + \beta_1 * veteran_i + r_1 * controls_i + \mu_i + \varepsilon_{1i} \quad (1)$$

$$veteran_i = \alpha_i + \beta_2 * d_age_i + \beta_3 * age18_i + r_2 * controls_i + \mu_i + \varepsilon_{2i} \quad (2)$$

其中，式（1）为结构方程，表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式（2）为 CMP 估计法第一阶段方程。 $Satis_fi$ 代表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veteran_i$ 代表被访者是否具有较完整的从军经历； $controls_i$ 为前文设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d_age_i 和 $age18_i$ 为本文工具变量。 μ_i 、 α_i 、 ε_i 分别为出生地区固定效应、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逐步回归思想,本文分别运用 Probit 模型和 CMP 估计法对从军经历的身份福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表 2 中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军经历变量始终对居民生活满意度发挥正向的影响效应,在加入控制变量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假设 1 通过初步验证并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较为完整的从军经历能提高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在 CMP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说明在 1969—1974 年间属于应征适龄人员的群体及恢复高考时年满 18 周岁的人群入伍概率更高,符合理论预期。*atanhrho_12* 系数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第一、第二阶段回归残差项相关,模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 CMP 估计法进行联合检验是合适的,其结果也优于 Probit 模型。据此,本文采用 CMP 估计法进行后续分析。另外,本文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既有研究存在一致性,如: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男性,有宗教信仰的个体生活评价相对更高 (Alesina et al., 2004; 周烁等, 2020)。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MP 第一阶段	CMP 第二阶段
<i>veteran</i>	0.0618 **	0.0605 **	0.0610 **		0.5270 ***
<i>d_age</i>				0.1983 *	
<i>age18</i>				0.1955 **	
<i>gender</i>			-0.0138	-1.3032 ***	0.0300 **
<i>hukou</i>			0.0095	0.1474	0.0040
<i>nation</i>			-0.0852	0.0016	-0.0286
<i>religion</i>			0.0568	-0.4825 ***	0.0286
<i>fa_job</i>			-0.0519	-0.0196	-0.0183
<i>mo_edu</i>			0.0123 ***	0.01246	0.0042 ***

(续上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MP 第一阶段	CMP 第二阶段
<i>sibling</i>			-0.0020	0.0304 **	-0.0052 *
<i>atanhrho_12</i>				-0.8337 ***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Wald chi ²	3.42	17.92	42.74	340.94	
Pseudo R ²	0.0004	0.0019	0.0045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以分样本回归、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方式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见表3）。首先，考虑到我国退役军人安置以返回入伍时户籍所在地为主，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退役军人身份福利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根据个体出生地划分东部和东北部、中西部两类子样本。结果如表3模型1、模型2所示，在两类地区子样本中，从军经历都能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其次，尽管本文样本选取符合实际情况，但鉴于女性退役军人样本比例很低，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可能因个别女性退役军人的变量取值存在偏差。有鉴于此，本文在此部分剔除女性样本再次进行检验。结果如模型3所示，在剔除女性样本后，从军经历变量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本文使用服役年限 *Vtime* 作为从军经历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模型4结果显示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最后，本文将生活满意度评分为3至5的个体赋值为1，另外两项赋值为0，以此修改被解释变量定义；对于问卷直接呈现的生活满意度五级评分，本文构造有序离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内在一致性，都反映了被访者对生活的认知评价和积极或消极的心理状态，本文将自评幸福感得分为4和5的个体标记为1，其余为0，构建主观幸福感指标重新进行检验。基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得到的模型5至模型7的从军经历始终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i>veteran</i>	0.6865 ***	0.5590 ***	0.6134 ***		0.2623 ***	0.1445 **	0.4385 ***
<i>Vtime</i>				0.3415 ***			
<i>atanhrho_12</i>	-1.5041 ***	-0.9811 **	-1.4589 ***	-1.7031 ***	-1.2693 ***	-0.3855 *	-0.6589 ***
样本量	3324	4233	3248	7557	7557	7557	7557
Wald chi ²	339.16	225.61	498.90	413.15	234.76	276.68	332.76

注：表中回归均使用 CMP 估计法；***、**和* 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除模型 3 不含性别变量外，其余模型均涵盖前文设定的所有控制变量；各模型均加入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进一步讨论模型稳健性

虽然前文已运用控制变量法与工具变量法来尽量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影响，但考虑到个体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家庭情况等可能影响个体参军选择的其它因素，本文进一步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保证个体参军行为的随机性。具体而言，根据控制变量的特征从非军人群体中匹配与军人个体 i 条件接近的非军人样本 k ，采用个体 k 的生活满意度作为个体 i 的近似反事实参照，以进一步明确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PSM 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样本必须满足平衡性检验要求（见表 4），以保证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系统性差异仅存在于核心解释变量。结果如表 4 所示，本文控制变量在匹配前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在使用 1:1 近邻匹配方法后，两组样本的 t 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各变量偏差降至 5% 以下，说明匹配后的样本数据符合平衡性要求。

表 4 1:1 近邻匹配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偏差降低比例（%）	t 值
<i>gender</i>	匹配前	0.0370	0.1288	-33.70	100.00	-3.96 ***
	匹配后	0.0370	0.0370	0.00		0.00
<i>hukou</i>	匹配前	0.1759	0.0488	41.00	89.10	7.53 ***
	匹配后	0.1759	0.1620	4.50		0.38
<i>nation</i>	匹配前	0.0787	0.0426	15.10	100.00	2.41 **
	匹配后	0.0787	0.0787	0.00		0.00

(续上表)

变量	样本	实验组	对照组	偏差 (%)	偏差降低比例 (%)	t 值
<i>religion</i>	匹配前	0.0324	0.0096	15.90	79.70	2.97***
	匹配后	0.0324	0.0278	3.20		0.28
<i>fa_job</i>	匹配前	0.7130	0.8698	-39.30	100.00	-6.28***
	匹配后	0.7130	0.7130	0.00		0.00
<i>mo_edu</i>	匹配前	2.4444	1.2968	34.70	95.20	5.60***
	匹配后	2.4444	2.3889	1.70		0.16
<i>sibling</i>	匹配前	3.8148	3.6271	9.90	67.90	1.43*
	匹配后	3.8148	3.8750	-3.20		-0.31

注：限于篇幅，上表仅报告了1:1近邻匹配方法的检验结果，另外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与此相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三种匹配方法得到的样本，本文分别采用内生 Probit 模型和 CMP 估计法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结果如表5所示，无论基于何种匹配方法，内生 Probit 模型和 CMP 估计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都与基本回归模型保持一致，从军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5 匹配后样本回归结果

	<i>Probit</i>			<i>CMP</i>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1:1近邻匹配	1:4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1:1近邻匹配	1:4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i>veteran</i>	0.0534*	0.0647*	0.0612*	0.5017***	0.5463***	0.5267***
<i>atanrho_12</i>				-0.9497***	-1.1307***	-0.8331***
样本量	2305	2363	7553	2305	2363	7553
Wald chi ²	24.86	24.09	42.09	275.72	353.50	341.35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 作用机制分析

退役军人身份福利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

中,前者是指个体通过退役军人身份依法享有就业、社会保险、住房等优待政策以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条件和提高生活评价;后者主要在于社会对某一身份和群体的认同能让拥有该身份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得到物质、心理上的满足。基于上述机理和我国保障政策的实际情况,本文从就业单位、社会保险、住房条件等方面探究从军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做进一步的检验。理论上,如果变量 M 是自变量 X 影响因变量 Y 的中间媒介,则称变量 M 为中介变量。根据依次检验法的思想,变量间的影响过程可用如下方程表示:

$$Y = c_1 * X + d_{1i} * Z_i + e_1 \quad (3)$$

$$M = a * X + d_{2i} * Z_i + e_2 \quad (4)$$

$$Y = c_2 * X + b * M + d_{3i} * Z_i + e_3 \quad (5)$$

其中, Z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e_1 、 e_2 、 e_3 为随意扰动项,使用 CMP 估计法依次检验 c_1 、 a 、 b 、 c_2 的显著性来判断变量 M 是否为 X 对 Y 的中介变量。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其中,表 6 模型 1 至模型 4 表明,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进入体制内工作,也提高了个体获取养老保险的机会,但退役军人与非军人群体在医疗保险获取方面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表 7 模型 1 至模型 4 则证实,从军经历有助于个体获得自有住房、积累社会资本并减少其负债的可能性,但“人情礼支出对数”变量的中介效应需要进行进一步检验。结合表 6、表 7 中模型 5 至模型 8 的回归结果,可以初步推断,就业于国有单位、参与养老保险、自有住房、较少的负债与更高的社会资本是从军经历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因素。

表 6 就业单位、社会保险机制分析

	模型 1 <i>job_1</i>	模型 2 <i>job_2</i>	模型 3 <i>ve_end</i>	模型 4 <i>ve_med</i>	模型 5 <i>Satis_f</i>	模型 6 <i>Satis_f</i>	模型 7 <i>Satis_f</i>	模型 8 <i>Satis_f</i>
<i>veteran</i>	0.1882 **	0.2389 **	0.3223 **	-0.1449	0.3983 ***	0.3886 ***	0.5263 ***	0.5276 ***
<i>job_1</i>					0.0788 ***			
<i>job_2</i>						0.0795 ***		
<i>ve_end</i>							0.0477 ***	
<i>ve_med</i>								0.0060 *
<i>atanrho_12</i>	-0.1258	-0.4023	-0.4158 *	0.3315	-0.5739 ***	-0.5364 **	-0.8383 ***	-0.8358 ***
样本量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Wald chi ²	1594.28	1435.76	405.47	313.68	371.66	340.08	379.73	343.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7 房产、负债与社会资本机制分析

	模型 1 <i>house</i>	模型 2 <i>debt</i>	模型 3 <i>lrenq</i>	模型 4 <i>renq_p</i>	模型 5 <i>Satis_f</i>	模型 6 <i>Satis_f</i>	模型 7 <i>Satis_f</i>	模型 8 <i>Satis_f</i>
<i>veteran</i>	0. 279 **	-0. 461 ***	-0. 0151	0. 4406 ***	0. 5389 ***	0. 5001 ***	0. 5409 ***	0. 5266 ***
<i>house</i>					0. 130 *			
<i>debt</i>						-0. 0880 ***		
<i>lrenq</i>							0. 0545 ***	
<i>renq_p</i>								0. 006 *
<i>atanrho_12</i>	0. 4142 *	0. 7591 ***	0. 0839 *	-1. 8687 ***	-0. 8753 ***	-0. 7733 ***	-0. 8869 ***	-0. 8327 **
样本量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7557
Wald chi ²	240. 12	669. 12	548. 88	483. 09	359. 18	405. 86	373. 21	345. 53

注：***、**和* 分别表示在 0. 01、0. 05 和 0. 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模型均加入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表 6 中模型 4 与表 7 中模型 3 的中介变量系数不显著，表 6 中模型 1、模型 2 的 *atanrho_12* 系数不显著，依次检验法不能验证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在此情况下，可用 Sobel 法对间接效应，即系数 *a*、*b* 的乘积进行显著性检验。结合 Breen 等（2013）提出的更契合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 KHB 法，本文对不显著的中介变量做进一步的系数乘积显著性检验（见表 8）。结果如表 8 所示，除医疗保险外，其余间接效应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进入国有企业就职、社会资本都是从军经历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显著性路径。而两种方法计算出的各中介变量的中介程度差异不大，说明检验结果稳定可靠。据此，除假设 4 外，本文其余假设均通过验证。而医疗保险中介效应不显著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医疗改革深化放宽了居民参保条件，而退役军人特殊医疗保险尚处于险种设计阶段，政策优惠的参保项目与非军人群体相似，进而导致二者并无显著性差异。

表 8 基于 Sobel 法和 KHB 法的中介效应检验

	Sobel 法				KHB 法			
	模型 1 <i>job_1</i>	模型 2 <i>job_2</i>	模型 3 <i>ve_med</i>	模型 4 <i>lrenq</i>	模型 5 <i>job_1</i>	模型 6 <i>job_2</i>	模型 7 <i>ve_med</i>	模型 8 <i>lrenq</i>
总效应	0. 0586 **	0. 0586 **	0. 0586 **	0. 0586 **	0. 1733 **	0. 1703 **	0. 1699 **	0. 1710 **

(续上表)

	Sobel 法				KHB 法			
	模型 1 <i>job_1</i>	模型 2 <i>job_2</i>	模型 3 <i>ve_med</i>	模型 4 <i>lrenq</i>	模型 5 <i>job_1</i>	模型 6 <i>job_2</i>	模型 7 <i>ve_med</i>	模型 8 <i>lrenq</i>
直接效应	0.0363 *	0.0438 *	0.0586 *	0.0565 *	0.1075 *	0.1263 *	0.1700 *	0.1652 *
间接效应	0.0222 ***	0.0148 ***	0.0005	0.0060 *	0.0658 ***	0.0439 ***	0.0001	0.0058 *
中介程度	37.97%	25.26%	0.53%	3.55%	37.96%	25.80%	0.70%	3.39%
样本量	7757	7757	7757	7757	7757	7757	7757	775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利用 Probit 模型和 CMP 估计法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1）从军经历能显著提高个体对其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且该关系在控制个体特征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显著存在。（2）从军经历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分地区样本和男性子样本中均显著成立，本文核心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可靠。（3）就职于国有单位、参与养老保险、自有住房产权、较低的负债可能性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本是从军经历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中介路径。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推动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改革。严格贯彻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制作为政府安排工作和排序选岗的主要依据，确保服役表现与保障待遇相匹配。国有单位可依据服役表现择优录取退役军人，充分挖掘优质人力资源，服务国有单位高质量发展，发挥国有单位在保障工作中的制度优越性。第二，加快健全退役军人社会保险体系。在进一步完善退役军人社会保险接续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保补缴工作多领域、多部门联动的复杂性和部分退役军人的现实困难，地方政府应牵头部署、合力攻关，更快、更好地推进退役军人社会保险补缴工作，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高异地社会保险转接效率，实现退役军人基本医疗、养老保险覆盖率的进一步提升。第三，稳步推进退役军人住房安置政策。加速推进军队安置住房统建试点工作，综合 32 个重点城市统建房项目的试点建设经验，严格规范申购条件、面积标准和房屋产权制度，在确保住房质量和住用稳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优

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尽可能提高基层军人的住房保障满意度。第四，高度重视英烈和退役军人的荣誉维护。加强烈士纪念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依托建军节等重大节日开展英烈纪念活动，通过探访老兵、宣扬其先进事迹等志愿活动拉近军民距离。积极推广退役军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鼓励退役军人在安置地振兴发展中充分施展才华和彰显价值，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军人群体的认同感，塑造全社会尊崇军人职业、关爱尊重退役军人群体、积极支持国防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持续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我国“军政军民团结”这一政治优势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参考文献

- 冯明、赵佳涵 (2022). 物价房价、预期与居民幸福感. 财贸经济, 7: 68-86.
- Feng, M., & Zhao, J. H. (2022). General Prices and Home Prices, Expectations of Them, and Residents' Sense of Happiness.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7: 68-86. (in Chinese)
- 何启志、李家山、周利 (2022). 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9: 18-30.
- He, Q. Z., Li, J. S., & Zhou L. (2022). Welfare or Pressure: How Household Debt Affects Residents'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Household Microdata.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9: 18-30. (in Chinese)
- 侯志阳 (2018). 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公共行政评论, 6: 87-111+211-212.
- Hou, Z. Y. (2018). Can Social Insurance Make Us Happier: The Mediating Role Based on Class Ident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6: 87-111+211-212. (in Chinese)
- 李江一、李涵、甘犁 (2015). 家庭资产-负债与幸福感：“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释. 南开经济研究, 5: 3-23.
- Li, J. Y., Li, H., & Gan, L. (2015). Family Assets Liabilities and Happiness: An Explanation of the Mystery of “Happiness Income”.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5: 3-23. (in Chinese)
- 李玉倩、陈万明 (2018). 当前我国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设置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8: 80-84.
- Li, Y. Q., & Chen, W. M. (2018). Research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agement and Support Institution of the Retired Soldiers in China.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8: 80-84. (in Chinese)
- 刘纪达、王健 (2019). 变迁与演化：中国退役军人安置保障政策主题和机构关系网络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4: 142-155+175.
- Liu, J. D. & Wang, J. (2019). Change and Evolution: Research on the Theme and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China's Retired Soldiers' Resettlement Security Policy.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4: 142-155+175. (in Chinese)
- 刘一伟、汪润泉 (2017).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9: 75-92.
- Liu, Y. W., & Wang, R. Q. (2017). Income Gap,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9: 75-92. (in Chinese)
- 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 (2017).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 经济研究, 52(10): 173-188.
- Lu, F. W., Liu, G. E., & Li, H. W. (2017). Children's Gender and Parents' Happines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0: 173-188. (in Chinese)
- 聂伟 (2019). 就业质量、生活控制与农民工的获得感. 中国人口科学, 2: 27-39+126.

- Nie, W. (2019). Employment Quality, Life Control an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Gain. *Population Science of China*, 2: 27–39 + 126. (in Chinese)
- 王沙骋、祝小茜、张艺博 (2020). 退役军人权益保障: 经验、问题与对策. *中国软科学*, 7: 16–25.
- Wang, S. C. , Zhu, X. Q. , & Zhang, Y. B. (2020).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x-servicemen: Experien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a Soft Science*, 7: 16–25. (in Chinese)
- 王元芳、徐业坤 (2020). 高管从军经历影响公司治理吗?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评论*, 1: 153–165.
- Wang, Y. F. , & Xu, Y. K. (2020). Does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of Senior Executives Affect Corporate Gover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Business Review*, 1: 153–165. (in Chinese)
- 吴愈晓、王鹏、黄超 (2015). 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学研究*, 6: 122–144 + 244–245.
- Wu, Y. X. , Wang, P. , & Huang, C. (2015). Family Asylum, System Asylum and Work Family Conflict: Employment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Urban Women. *Sociological Study*, 6: 122–144 + 244–245. (in Chinese)
- 叶金珍、王勇 (2019). 相亲结婚真的靠谱吗——基于 CFPS2014 数据的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1: 117–136.
- Ye, J. Z. , & Wang, Y. (2019). Is Dating and Marriage Really Reliable: Research Based on CFPS 2014 Data.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1: 117–136. (in Chinese)
- 张抗私、刘翠花 (2018). 工会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幸福感? *财经问题研究*, 3: 116–122.
- Zhang, K. S. , & Liu, C. H. (2018). Does the Trade Union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3: 116–122. (in Chinese)
- 张伟东 (2008). “421”家庭结构与独生子女军人的福利保障制度设计问题初探. *人口与经济*, 2: 71–75.
- Zhang, W. D. (2008). On the “421”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Design of the Welfare and Security System for Only Child Soldiers. *Population & Economics*, 2: 71–75. (in Chinese)
- 张翔、李伦一、柴程森、马双 (2015). 住房增加幸福: 是投资属性还是居住属性? *金融研究*, 10: 17–31.
- Zhang, X. , Li, L. Y. , Chai, C. S. , & Ma, S. (2015). Housing Increases Happiness: Investment Attribute or Residential Attribut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0: 17–31. (in Chinese)
- 周烁、金星晔、伏霖、李涛 (2020).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居民创业行为: 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 *世界经济*, 3: 26–45.
- Zhou, S. , Jin, X. Y. , Fu, L. , & Li, T. (2020). Resident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ppiness Economics: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hina.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 26–45. (in Chinese)
- Akerlof, G. A. , & Kranton, R. E.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715–753.
- Alesina, A. , Tella, R. D. , & Macculloch, R. (200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Are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Differ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 2009–2042.
- Bertrand, M. (2013). Career, Family, and the Well-being of College-educated Wom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 244–250.
- Breen, R. , Karlson, K. B. , & Holm, A. (2013).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42: 164–191.
- Coile, C. , Duggan, M. , & Guo, A. (2015). Vetera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hat Role Does the VA's Disability Compensation Program Pla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 131–136.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1: 34–43.
- Easterlin, R.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89–125.
- Hoelter, J. W. (1983). The Effects of Role Evaluation and Commitment on Identity Salien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 140–147.

- Law, K. K. F. , & Mills, L. F. (2017).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2: 141 – 184.
- Leung, A. , Kier C. , Fung, T. , Fung, L. , & Sproule, R. (2011). Searching for Happines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 443 – 462.
- Leung, L. A. , Lau, C. (2017). Effect of Mortgage Indebtedness on Health of U. S. Homeowner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 239 – 264.
- Salm, M. (2011). The Effect of Pensions on Longevity: Evidence from Union Army Veterans. *Economic Journal*, 552: 595 – 619.
- Tajfel, H. (1978). Social Categorization,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mparison.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1: 285 – 295.
- Tajfel, H. , & Turner, J. C.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13: 7 – 24.
- Zelaya, C. E. , & Nugent, C. N. (2018). Trends in Health Insurance and Type among Military Veterans: United States, 2000 – 2016.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 361 – 367.

责任编辑：朱亚鹏